



□孙南娜

《天下在河上——中国运河史传》中说:“运河山东境内的会通河段,水源最为金贵,因此在山东的东平、滋阳、邹县、曲阜、泗水、滕县等14个州县共设有管泉老人98名、泉夫2632名,专门负责看护供运河的泉源。”这里说的是明代初年治理会通河之后的事。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,尤其是明清两代,乘船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官员、文士,对运河之事多有记述,然而说到泉河济运的管泉之事却非常罕见。难道管泉之事不重要吗?不,在明清时期极其重要,甚至重要到就连当今对运河有所研究的学人,初闻此事也会感到吃惊的程度。

京杭运河全程“水脊”(至高处,分水岭)在山东,此处运河之水分南北流。因地理环境所致,在京杭运河会通河段为调节水势而修建的闸坝也特别多。虽如此,临清至沛县沽头段运河仍是水源不稳,时患浅涩。至明代初期,因连年战争,疏于治理,这段运河已难以通航。

燕王朱棣即位后,于永乐四年(1406年)决定迁都北京,以南京为留都,直到永乐十九年(1421年)才正式迁移。这期间,朱棣为迁都做准备而建设的有两大工程,一是修建北京皇官、京城,二是整修京杭大运河。永乐九年(1411年),负责运河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山东运河不畅问题,重开会通河。他听从汶上白英老人的建议,筑东平戴村坝,把运河南北分水点由任城(今济宁)调整到南旺“水脊”处,引河、湖、泉水济运。因地势北高南低,在南旺“水脊”控制分水,七分流往北,三分流往南,使京杭运河山东段得以通行。永乐十三年(1415年)明王朝停止海运,南粮北运全走运河一路。

鲁中至鲁南泰山山脉自古多泉,引泉济运是明初整修运河的重大工程之一。永乐十七年(1419年),在漕运总兵官陈瑄的建议下初浚泉源,泰山山脉西侧所能利用的泉源几乎都被引入运河。明代胡伯玉撰《泉河史》说“自会通河成,而涓滴皆为国家助矣”。明代张克文撰《泉河纪略》序说:“国家雄据燕都,漕河为之命脉。转输东南粟,岁计四百万石。”

当“涓滴”泉水上升到“国家”大事的时候,对泉流的保护也就异常重要了,为此,漕运专门设立了管泉主事等官员和专项负责此事的役夫。《天下在河上》所引数字出自《大明会典》,山东涉及泉河济运的14个州县及管泉者分别是:东平州设管泉老人2名,夫72名;滋阳县设管泉老人2名,夫30名;邹县设管泉老人5名,夫120名;曲阜县设管泉老人1名,夫30名;泗水县设管泉老人9名,夫195名;滕县设管泉老人15名,夫550名;峰县设管泉老人3名,夫60名;宁阳县设管泉老人6名,夫187名;泰安州设管泉老人14名,夫237名;新泰县设管泉老人14名,夫224名;肥城县设管泉老人3名,夫61名;莱芜县设管泉老人10名,夫215名;沂水县设管泉老人10名,夫500名;蒙阴县设管泉老人4名,夫150名。永乐十七年初浚泉源,以后每隔数年查访疏浚一次,新的泉源不断增加,据邹逸麟先生《山

东运河历史地理初探》说,明代山东泉源济运最多时涉及三府十八个县。

数字虽然是枯燥的,可正是因为有这组数字在,才让后人知道当年会通河段管泉范围之广,人数之众。这些管泉老人和泉夫究竟对泉流是怎么管理的?至今还没发现管泉者记其事的文字。想来也是,驿站之事在中国实行了那么多年,任务又是那么重要,今天国内也仅存有清代光绪年间,河西驿幕沈侨如先生留下的一册116天《河西驿纪略》。这么一想,管泉事务、规则只字无存也就理解了。毕竟此项工作太普通,即使当年有文字记录,也会因为引起大家的重视而湮灭了。引泉济运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,难道泉流管理之事在书中真的是一无所存了吗?也不是的,若仔细寻求,在其他史料、诗文中还能发现一些管泉事迹。

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山东管泉老人、泉夫最多者是滕县(今滕州)。说来明初京杭运河还没有开挖南阳新河和泇河,运河没有经过滕县之地,然而滕县东部是连绵的群山,地势东高西低,那时南四湖(今统称微山湖)还没有连为一体,滕县的泉流也要为国家运河助一臂之力,水或导引到运河水柜,或直接注入流经谷亭(今鱼台县驻地)、沛县的京杭运河。

其实,上述14个州县大多远离运河,都在为济运作“无私奉献”。“涓滴皆为国家助矣”,对滕县当地的农事、民生有没有影响呢?明嘉靖乙丑(1565年)科进士王元宾,曾为家乡纂修《滕县志》(万历十三年版),他在卷三“山川”末有记:“元时滕州有稻堰,称饶给;国朝十八泉,则一切规之以济漕。而行水者奉法为厉,即田夫牵牛饮其流,亦从而夺之牛矣。一害也。”他接着又说到因济运开渠、筑坝对当地造成的二害、三害。因泉水济运,竟然连田夫饮牛也不可以,这似乎太过分了!为此,王先生大不满意,可国事大于民事,也只能在所编志书上记它一笔。

到了清初,滕县黄兰森以诗的形式记有管泉之事,寓意委婉,不知泉事的人大约很难明白黄先生的诗意。黄兰森是清康熙十五年(1666年)进士,他写有《缴沟泉野居》诗六首,其一是:“涓滴泉流济会通(原注:运河名会通),官蒲官柳长春风。居人若得溪边水,会种芙蓉万顷红。”《泉河史》载,缴沟泉为滕县济运之泉,距县城西南三十里迎仙乡。居民虽住在泉边,那水也不是随便动用的,因此“芙蓉万顷红”只是他的美好向往,或者说是一种无奈情绪的表现,身边的泉流只有滋润“官蒲官柳”(济运)而已。

据《泉河史》载,滕县有“浸五”“湖二”“泉旧十五,新四,凡十九”“桥六”(涉及泉流),另有薛河坝。滕县最东部的泉源流入西南运河约百余里路,泉流如此之多,其水不能饮牛,不能引灌,可知管理泉流者人多事忙了。胡伯玉在《泉河史》说:“弘治以前载于图记者,一泉多至三四十人,少不下十人;嘉靖之际,业去其半,然其少者犹足当今之多。”胡伯玉是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进士,他所说的“当今”由《泉河史》序言看是万历中期的事。管泉人相继裁革,然而泉流管理却不见放松。《泉河史》有言:“河渠有专官例不得亲民。”“不得亲民”是他们的工作,管泉人各司其职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管泉岂止对小民严格,即使贵为孔府之家有关泉事也不能任意而为。《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》载: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十一月,康熙帝到曲阜孔府祭拜孔子。礼拜后,衍圣公孔毓圻等趁机奏称:“圣庙前有桥,池中无水。曲阜城外有泉,可以开通引入城内庙前池中。且此泉水不通运河,原非济运之水。今遇圣驾亲临,谨此冒昧奏请。”御批是:“大学士明珠、王熙、衍圣公孔毓圻等所奏,曲阜城外泉水既不关系运河,著准其开通入城,交与该抚遵行。钦此。”孔府圣人欲引城外泉水入城,要由当朝皇帝批准,而且还要找个“此泉水不通运河,原非济运之水”的理由,当年泉流济运管理之严可以想见了。

明清两代,乘船行于京杭大运河的官员、文士留下著述者甚多,韩国崔溥的《飘海录》,海宁谈迁的《北游录》,嘉定王初桐的《北游日记》等,对运河考察颇详,只是不涉泉事,这是因为管泉者的工作不在运河边上,他们目未睹、耳未闻,何记之有?倒是王元宾、黄兰森这样的文人,适逢其时,身处其地,亲历其事,对泉事感受最深,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,一不注意就会形成文字,而流传下来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“南北榜案”与成武状元韩克忠

□张长国

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取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,从隋唐时期开始,就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,也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科考案件。明洪武三十年的“南北榜案”就是其中一个,因为这个事件,成武县人韩克忠被明太祖朱元璋钦点,并成为明代山东第一位状元。

韩克忠(1370年—1439年),今成武县城北二里韩庄村人,据清道光《城武县志》记载:“韩克忠,字守信,洪武丙子科举人。丁丑,刘三吾、白信蹈主试,忠不与中式之列。刘白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,江北无一与者……”在洪武三十年(1397年)二月,明朝举行会试,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白信蹈主持,结果,包括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在内,录取的五十二人全部是南方人,结果引起北方举子的质疑和上告。朱元璋令人查清后,对两个主考官一个流放,一个处斩,并在六月重新进行了考试,所录取的六十一人全部是北方人,并钦点成武人韩克忠为状元。此事轰动天下,史称“南北榜案”。韩克忠中状元后,首先出资在家乡成武的县城东门内修了一座状元坊,此牌坊在上世纪60年代尚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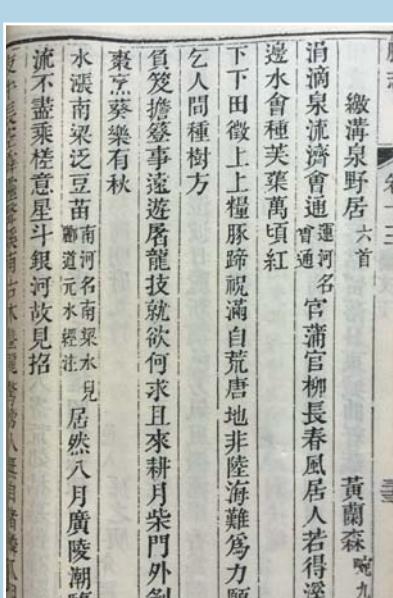
朱元璋的家乡是安徽凤阳,与山东成武距离不远,因此朱元璋对成武举子韩克忠有着天然的好感。在朱元璋殿试的时候,朱元璋出的题目和“时事”结合得非常紧密,叫做策问,这从韩克忠的状元卷中就可以看出。“皇帝制曰:天生烝民有欲,必命君以主之。君奉天命,必明教化以导民……朕承天命,君生民,宵衣旰食三十余年,储思积虑,欲安生民。其不循教者亦有,由是不得已施之五刑。今欲民自不犯,抑别有其术欤?”朱元璋这个问题的大概意思是,其做皇帝很多年,处心积虑想让百姓安居乐业,但是还有人犯法受到惩罚。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让百姓不犯法?韩克忠的回答是:“臣对:臣闻五常乃民生固有之善,五刑实人君辅治之具……钦惟皇上诞膺天命,奄有万方,为生民立命,为万世开太平,宵衣旰食,励精图治,已有年矣……臣愚以为,法愈严而人愈犯,盖由人心不古而轻犯之耳。今欲令行禁止,民不犯法,臣以为当再明号令,颁布中外。彰善瘅恶,树之风声,俾克畏慕,使民彬彬然为善,而不至于为恶者也,不过明五常之教,而用五刑以辅其不及而已。”

在这个策论中,韩克忠说出刑罚是治理国家的辅助措施,之所以法律越严而受刑罚的越多,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古人醇厚,轻易就犯法了。他还举出对策,就是再明号令,颁布中外,惩恶扬善,在社会上弘扬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风尚。这和如今的法制宣传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同时,韩克忠在策论中还对朱元璋大大颂扬一番。朱元璋看后朱笔一挥,钦点韩克忠为状元。

韩克忠中状元后,朱元璋先让他担任翰林院修撰,三个月后改任国子监司业。国子监是国家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,针对当时国子监学政松弛的情况,他和祭酒张显宗一起制订了相关制度,并报朱元璋批准后实施,振兴了学习风气。在国子监司业任上,韩克忠还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,做到知人善任。成武县人王宾在保安郡安州担任学正,教育有方,门人多有所成,洪武三十一年,韩克忠以“德才兼备”向朱元璋荐举,于是,王宾升任了辽州直隶州知州,任上勤政爱民,受到百姓赞颂,最后做到了顺天府府丞,可见韩克忠的识人之能。朱棣夺取皇位后,他被贬谪为涿鹿令。直到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即位后,韩克忠才转为监察御史,但级别仍然是正七品,最后在任上去世,归葬家乡。

因为《明史》上记录韩克忠是“武城人”,造成许多人把他当成了如今的德州市武城县人,引起了名人故里之争。其实,这并不是《明史》的误写,清初编《明史》时,是按照当时的明朝史料编写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菏泽历史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徐子红先生考证指出:“《清史稿·地理志·山东·曹州府》载:‘城武……明洪武四年,属济宁府,寻改属兗州府,以城武为武成。’”这就说明,在明初,成武县被改名为武城县,清初编写《明史》的时候,时人尊重历史而照实记录,并非误笔,更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韩克忠家乡是德州市武城县。

清乾隆二十一年的《曹州府志》多处记载了成武县韩克忠的事迹及墓葬地;在成武县,还有许多韩状元的遗迹,包括状元墓、状元坊等,都记载于清道光《城武县志》,这是韩克忠家乡在成武的有力证明。



滕县黄兰森以诗的形式记有管泉之事



会通河南旺“水脊”

投稿邮箱:
qlwbrwq@163.com